

在跨文化的历史中展开中国基督教研究

张西平

中华文明在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之所以延存到今日,并仍生机勃勃,地理位置的相对独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四周的自然的屏障保护了北起大漠、南至大海、西临高原、东至大海这广袤地域的文明发展,相对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来说,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

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外部文明的交流。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的交流有两次,一次是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一次是从欧洲传来的基督教文化,这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从学术史的研究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中国史的研究或者说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其成绩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根本无法相比的。笔者仅仅从有关书籍和网络上做了收集,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研究领域相差的距离有多大。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大体有这些著作: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1940)为现代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汉传)佛教通史;周叔迦居士的《中国佛学史》是其佛教史研究的代表作;吕澂、法尊、黄忏华

等人联合编写的《中国佛教史略》(第一册)、《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宗派源流》及第二册中的《中国佛教人物》都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1928年出版的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是国内学术界的第一本中国佛教史专著;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胡适的《禅学古史考》(1928)、《楞伽宗考》(1935)、《菩提达摩考》(1927)则开创了中国禅宗史的研究。葛兆光的《中国禅宗思想史》(1995)则是新时期禅宗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学术界在中国佛教史的文献整理上更是倾入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由著名佛学专家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校勘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空前的新编大藏经,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种,2300余卷。它从宋、元、明、清各种版本大藏经及房山石经、高丽大藏经中选用最好的版本作底本,用其他诸本进行校勘,其参校版本之多、校刊之精细,是以往各种大藏经不能比拟的。全书分正、续两编,每编100册左右,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现已出版90余册。

中国佛教典籍的点校注释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第一辑22种,现已出版10余种,其中点校类有《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古尊宿语录》、《出三藏记集》、《神会和尚禅话录》。校释类有《坛经校释》、《三论玄义校释》、《童蒙止观校释》、《高僧传校注》、《大乘起兴论校释》。

这里仅仅是举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就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中国史研究之深入,文献整理之全面,这里笔者仅仅是举几个例子,如果细细展开,绝非几万字可以写完。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从民国以来,大陆学术界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出版物有: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社会》,顾为民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社会》(《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王立新的《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吴

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赵晓阳的《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与现代的探索》，刘家峰的《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1907—1950）》，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陈建明与刘家峰合编的《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林金水的《台湾基督教史》，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王文兵的《丁韪良与中国》，郝平的《无奈的结局》等。近年来对来华传教士研究取得研究进展，王毅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另外新出版的《离异与融合：中国基督教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等系列丛书也从多个方面对来华基督教展开研究。我这里只是简单罗列了一些近年来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著作，自然很不全面。

平心而论，这三十年中国基督新教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上的进步微小。张西平和卓新平编的《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秦和平的《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周振鹤主编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丛书》和《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都是从基本文献入手的整理和翻译著作。张西平、顾钧主编的《中国丛报》是一份对西文文献的基础性整理工作。

只要对照一下中国学术界对佛教史的研究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年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史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至今学术界尚拿不出从唐代景教传入到晚清基督教传入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性著作。目前的研究绝大多数处在个案研究阶段，即人物、著作、事件等的研究之上。这样的研究结果是符合学术发展的。因为，学术研究总是从个案开始，进而进展到断代史研究，最后是通史性研究。但我们只要和中国佛教史研究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的差距之大。

研究的差距，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文献整理的差距所造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已经长达千年之久，至今学术界仍在孜孜不倦地在做基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唐代的景教文献有限，其主要文献是在晚明之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目前在文献上所做工作。从基督教来华的

中文文献来说,目前在对明清之际天主教中文文献的整理上,汉学家钟鸣旦等人整理出版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原徐家汇藏书楼运往台湾的文献,这些文献的整理继承了当年吴相湘、方豪的传统,值得肯定。但在中文文献上若无中国学者参加,期间的不足仍是有的。由张西平教授和马西尼教授主编,由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梵蒂冈图书馆合作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即将整理出版,这将会大大推进明清天主教基础文献的整理。但在对来华传教士外文文献的翻译和整理上,进展缓慢。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集十余年之力,也不过翻译出版了三十余本文献和著作,如果和日本学术界对来华传教士西文文献的整理相比,实在令中国学术界汗颜。当年陈垣先生在谈到明清天主教研究史时曾表示过,应像《开元释教录》那样,做出中国基督教的文献目录,像《宋高僧传》那样做出中国的基督教人物传记。陈先生所讲至今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我看来,仅仅明清天主教的西文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可能就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没有卧薪尝胆的决心是做不成这件事的。

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新教来华历史的文献整理相差就更远。从80年代开始,多卷本的《清末教案》仍是值得赞许的一件工作。在中文文献上来华的基督新教文献数量至少要比明清之际的来华天主教的中文文献多几十倍(这个只是我的估计,很不准确),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出版工具是印刷机,而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仍是木版印刷;其二,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明清之际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虽然,晚清时那些来华的传教士不再像利玛窦那样读中文书,中文写作能力也大大下降,但仍有一批新教的传教士坚持用中文文字传教的原则。至今,我们对基督新教传教士的中文文献连个基本书目都没有。章开沅先生所主持的清史项目中,有一个基础文献的整理项目,我们期待着。基督新教的外文文献的数量更是要大大超过明清之际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外文文献。这些年周振鹤先生作了很大的努力,去年傅兰雅的基本文献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都是非常值得赞许的。近年来苏精先生在基督新教来华历史的研究上取得学界瞩目的成绩,他的《中国开门:

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上帝的人马》等都受到学界好评,究其原因在于苏精先生直接使用了英国伦敦会的原始档案。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有新材料,才会有新成就。可以这样说,对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史的中文和西文文献的整理工作,我们才刚刚迈出很小的一步。仍有大量的工作待我们去做,这件事恐怕也要两代人才能完成。

陈寅恪在陈垣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今天,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来说,陈寅恪先生这句话仍十分重要。没有新材料就没有史学之进步,没有对基督教来华史基本文献的系统整理,就不可能有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新突破。陈寅恪先生在谈到敦煌学时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核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借未由。”

今日中国基督教史亦是如此,大量的文献藏于国外,至今无论是藏在国外的中国基督教史文献,还是藏在国内的文献,均无基本目录,如陈先生所说:“不易检核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借未由。”

在一定的意义上,对基督教来华的研究要远比佛教传入中国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大些,需要一个更大的文明视野、更宽阔的学术空间方能消化和理解这次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

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使亚洲两个伟大的文明连接起来,佛经的翻译主要是从巴利文和梵文翻译成中文。而基督教的传入将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

连接了起来,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则是从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翻译而来的。在语言的种类上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复杂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当年来到中国内地和西域的和尚们,一心一意在做从梵文、巴利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他们很少把中国的文献翻译成梵文和巴利文。古时天高路远,印度或西域来的僧人们不少葬身于西域的高山和大漠之中,即便顺利来到中国内地,也很少有人能返回祖国。而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不少是双面手,一手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用毛笔写中文著作,一手用他们的鹅管笔写西文著作,这点是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们所无法比的。传教士大都是从海路来到中国,那时海路虽风高浪急,但此时人类文明已经基本上可以驾驭海洋,从里斯本到澳门往返一次要三年,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风也卷走了不少传教士,使他们葬身于大海。但绝大多数传教士还是越过了大洋,来到了遥远的东方。期间返回欧美者为数不少,回国后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回顾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这样的著作数不胜数。

更为复杂的是,印度的和尚们来中国时个个谦和安静,中印两大文明相互学习融合千余年既无教案,也无国家之间的冲突。千年佛风,万里禅音,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基督教来华,欧美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融合则是跌宕起伏,期间既有仙花寺中的谈书论道,也有望厦条约时,传教士们佩剑带刀与中国官员的唇枪舌剑的论战。文化之冲突、国家之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合步履艰辛。百年历史,中国之世界,世界之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复杂与多维度已是丝绸路上的文明相遇所不能比拟的。

由此,我才认为,今日中国基督教史或由此而展开的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跨文化研究乃学术之潮流也。从中国近代史来说,中国基督教史说不清楚,中国近代史就说不清楚;从世界史来说,来华传教士的文献说不清楚,欧洲自己的历史也就说不清楚。在全球化史逐步取代传统的世界史研究范式时,文化之间的接触史成为关键,跨文化研究日益成为学术展开之必由之路。基督教史在全球化研究中之重要性就在于它记载了大

量文化之间的接触史的文献。这批站在中西交流之桥上的传教士成为面向东西方的文化传手,从此,我们和西方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汉学史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

做学问抓不住关键点,学问难以进展。而目前,系统整理、收集、翻译近四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以基督教来华史为其重点,显然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关键之一。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近十五年来紧紧抓住这个重点,甘为学术界做嫁衣,为后人铺路,虽进展中也时有瑕疵,但仍受到学界之认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抓住了“学术之新潮流”。

2007年是基督新教传教士入华200周年,世界各地不少地方召开学术研讨会纪念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和利玛窦同样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基督教史的奠基人,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一直将传教士汉学作为中心的重要研究内容,作为英国汉学奠基人的马礼逊也自然在我们的研究之中。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图书馆、澳门基金会合作,经过近六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国内第一套《马礼逊文集》,这套文集不仅仅重新翻译了《马礼逊回忆录》,使其译本更为真实和全面,而且也首次出版了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通用汉言之法》、《英吉利文话之凡例》、《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马礼逊研究文献索引》等十四卷珍贵的文献,这些文献的出版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为了纪念马礼逊来华200周年,2007年,澳门基金会、香港大学和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联合在澳门召开了《纪念马礼逊来华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成果就是奉献给读者这本关于中国新教来华历史研究的论文集。用马克思的话结束我的序言:我们只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学。

2010年9月7日定稿于巴黎

(本文原为即将出版的《纪念马礼逊来华
2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序言)